

结合成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

## 【思 考】

# 西方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范式“陷阱”

袁 剑

民族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分类现象，是历史进程中左右社会转向的一个重要力量。民族史研究一直是世界历史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在整个世界日益全球化与网络化的今天，各个国家的民族史研究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也日益深化。对民族现象的研究，其最深层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并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与国家，并更好地促进与本社会同胞的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源头的西方世界对民族史研究的解释模式与论证方式，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警惕西方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范式性“陷阱”。

随着二战之后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由欧洲的传统汉学式研究转向美国的区域研究式，其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也经历了这种转变。从总的情况来看，对于中国民族史中细节性问题的考证已经不再占据研究主流，对于民族问题的总体性理论建构开始成为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趋势，而范式“陷阱”就出现在这里。

首先，西方学界经常会以自身场域中的“民族”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史问题，而忽略了中国民族史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与社会背景。很多西方研究者并没有到过中国，故而缺少对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体认。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民族现象难以用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或“种族”加以明确分类，而且其在历史上的记载也往往颇具跳跃性。在以逻辑分析见长的西方话语圈内，如果过于强调以某种连贯的逻辑将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材料“连缀”起来的话，就会出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情况。这种写作方式如果被国内学界所效仿，那么不仅会对历史研究而且会对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出于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形成的政治建构式或文化想象式的主观认识，在对具体的民族现象加以论证的过程中，西方学界往往会将现代中国所具有的诸多跨境民族在历史上构建成或想象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将这种结论反推至现代，从而为中国目前现实存在的某些民族分裂活动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尽管西方学界强调学术与政治分离，但是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环境中，作为西方学者个人化思想成果的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某些结论，很容易被一些人以特定目的加以别样的解读，从而造成现实政治中的不良后果。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基于对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现象的普遍承认，部分西方研究者经常会在对中国民族史问题的总体性论证架构中暗含一种“西方式民族—国家类型趋势不可阻挡”的预设，并在对中国民族史问题的探究中进一步强化这种认识。在苏联、南斯拉夫发生解体并分化为多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面前，国内学术界必须警惕这种西方研究所隐含着的单线性的“民族—国家”路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稳定所造成的误导与危害。

概言之，只有在对西方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加以充分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与范式性误导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进而提出合理而有效的应对之策。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09年12月4日第6版。作者系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博士）

